

【名家背影】

生命，永远是清晨六点钟

——追忆张蕾老师

□金翠华

摊开52年前的日记本，我看着看着，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在练声。这声音是那样亲切，是我在齐河参加社教运动时经常听到的声音。

1964年11月8日，到齐河的当天夜里，我们坐在行李卷上。小油灯在张蕾老师刚盘好的锅灶上忽閃忽閃地亮着。张老师嘱咐大家：“演员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床，跟着我练声！”

从此，我们风雪无阻地跟着张老师练声，用老乡的话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在台上又喊又唱，咋不哑嗓呢？都练成金嗓了！”

你听，远方那雄浑深沉的声音是张老师，豪迈奔放的是孙兆舜，响亮高昂的是高英，从更远处传来的“啊——巴——擦——达”是王金龙，他在《箭杆河边》里扮演二赖子。他说话张不开嘴，张老师带他练发音，他很认真，天天比别人起得早，把拼音练得滚瓜烂熟，谁都没想到他在台上撒音拉调地把二赖子演得那么好，以至于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围着他“二赖子！二赖子”地喊着。他也不嫌烦，摸着孩子们的头，嘱咐他们：“长大了好好学习，将来我教你们！”我们那时多么年轻！“将来”在我们心里是那样明亮，我们勤奋学习，就是为了“将来”报效祖国。如果当时有人说王金龙的“将来”已很短暂，他的理想根本就不能实现，我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。多少年

后，我始终无法了解王金龙工作不到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，他的心、他的尊严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究竟受到怎样的凌辱和践踏，致使他精神失常，终日恐惧逃窜。妻子到处寻找，最后发现他悬挂在荒野的一棵树上……

而此刻，我分明听到王金龙“啊——巴——擦——达”的声音清晰有力。我拐出胡同循声向村外走去。“老金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。我扭头一看，晨光熹微的井台，陈伟华正在打水。刚到这时时，后勤组的陈伟华挑着水桶去打水，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，小杨说我去看看。又等了很久，两人都不见影。原来陈伟华把桶掉在井里了，好在水桶还漂在水面。小杨弯腰捞桶时，揣在棉袄口袋里的钢笔掉井里了。那年头，有一支铍金钢笔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同学们都为这支钢笔惋惜。最难受的是陈伟华，他低头不语。

张蕾老师突然煞有介事地问小杨：“你那钢笔里灌满钢笔水了吗？”小杨心疼地说：“灌满了！我昨晚整理完地主的发家剥削史，就把钢笔灌得满满的。”张老师郑重地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应该打个报告，给小杨记一大功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他做了一件千秋万代都要纪念的大事！”我们大眼瞪小眼，不知老师这话的含义。张老师目光里含着幽默的笑，说道：“还记得那个笑话吧？地主的儿子见人写诗，他也找来纸笔，可咬烂笔杆也没写出。他的妻子说：郎君写诗怎么比妇人生孩子还难？地主的儿子说：娘子生产是腹中有物，我今腹中空空连一点墨水都没有，岂能写出？”老师话音刚落，笑声像炸锅一样。同学们引伸着故事的寓意：“这下可好了！一井墨水尽管喝！”“人人肚子里都有了墨水，这个村子可就成了典型的文化村。”

陈伟华熟练地提上第二桶水。“老金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着快点毕业快点工作，我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引进来，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！你说组织会信任我吗？”我从他的话语里听到的是诚实的热忱，是一个从印

度尼西亚回来的学子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。

1995年夏，分别三十年的同学聚在灯光明亮的餐厅，没有了在校时的拘谨，觥筹交错，畅所欲言。突然，有一阵哭声冲出来，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。

“我终于见到同学们了！”陈伟华泪流满面地站起来，“今天，组织总该相信我了！我父亲在美国给我买了房子，可我没有去，我经历过这里的苦难，我要留下，付出我的生命，使这片土地变得美好！可当年我得不到信任，我要入团，就是不批准，说我是资本家的孩子……”

三十年前冬天的那个清晨，年轻的陈伟华信心满怀，轻松地挑起扁担，自豪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老金，我像不像农民？”正好张老师从村外走来，用舞台上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几时听农民问过我像不像农民？像不像用什么来鉴定？是用思想和情感！”陈伟华没有放下肩上担的水，诚恳地问：“老张同志（当时规定，以同志相称），你说我怎样才能从思想和情感上像农民？”张老师走到他身旁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陈伟华两脚踏实地站着，水桶纹丝不动。张老师用赞赏的目光自上而下打量着他，亲切地说：“老陈同志，我认为你已经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感情！”

1965年4月2日，张蕾和查国华两位老师返校，为我们的毕业考试，论文答辩做准备。我们送到村外。陈伟华满眼泪水地说：“老张同志，你是我的知音！是您让我有了自信。”

青春展示给我们的画面是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行，大地百花盛开，莺歌燕舞……谁都没想到，等待我们的画面恰恰相反。我们剧团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亲历了荒时暴月的冲击和涤荡，焦灼的暗夜，星宿也不发光。历史长河奔流到2007年，张蕾教授在他的散文《缅怀严薇青先生》（见张蕾著《斜阳居杂缀》，作家出版社）中概述了当时参加社教的背景：“下去之前，遵照上级指示，根据师生个人政治条件的好坏，将全系人员分成两个队，一个是工作队，一个是文化队；工作队搞社教，文化队受教育，改造

世界观。很显然，文化队员比工作队员，在政治上矮了一截，为此，曾使许多学生抬不起头来。后来中文系隶属的那个社教大队部，要求中文系从文化队员中抽调数十名学生和几名教师，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，配合社教运动搞文艺演出，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。”

多么平静的客观叙述！我却感触到大地起伏般的呼吸。那是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无比的疼爱！我终于理解了，在5个月的社教演出中，张老师言传身教，不仅出自一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，他还要完成来自内心的重要使命：启发这些学生自尊自重地成长，帮助他们消释心中的压抑和自卑，开掘自身潜力，掌握服务于社会的本领，使他们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谦卑谨慎有自信，以清晨六点钟的生命姿态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。

大队部对剧团的总结是：“山师文教队中文系巡回演出剧团，根据党的方针政策，边编排、边修改、边演出，五个月共演出了十二个大中型、十一个小型剧目，组织了五十场大型演出，近二十场街头宣传，演出地遍及齐河及邻县。最多的一场看戏的有4000多人。二十多万观众看了演出。贫下中农说：‘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。’”我们都知道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张老师艰辛的付出。他既是演员，又是所有剧目的导演，还要指导化妆、布景、道具。这个在讲台上妙语连珠的写作教师，来到农村事无巨细都抢先动手，从挂幕布、办黑板报，到挖沟耕田、推独轮车……

我的日记本静静地翻开着。刚才，它领我穿过历史的甬道，重新感受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。52年之后，我读出了另一种真实。我读懂了张蕾老师在那段特殊的日子说的每一句话、做的每一件事，读懂了他无法言说的良苦用心，读懂了在那荒谬压抑的岁月里，他那充满了悲悯情怀的高贵心灵。这一切，是用铁笔镌刻在心灵磐石上的。它们必存留到永远。

（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）

【谈古论今】

张居正的『拙于谋身』

□于永军

冷眼看中国历史，一部治国理政史，说白了就是一部政治精英政治舞台表演史。其中，固然不乏生前辉煌身后荣耀、人生完美收官的优秀人物，如战国的范蠡、汉代的张良、唐代的郭子仪、清代的曾国藩等等。但也有不少生前大红大紫，身后凄凄惨惨的悲剧人物，最典型的如大明内阁首辅张居正。

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、改革家，也是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。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，整饬朝纲，巩固国防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改变税赋制度，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他在内阁首辅、太师、太傅、中极殿大学士的煌煌高位上病故，被迫赠上柱国，谥号文忠，备极哀荣。然而，就在他卒后的第四天，尸骨未寒，朝廷七名言官一同上书弹劾其得意干将潘晟，潘被明神宗下令致仕，之后言官们又剑指张居正本人，从诬陷辽王到以权谋私、贪污受贿、奢侈腐化，万炮齐轰，终被神宗定为“诬蔑亲藩，钳制言官，蔽塞朕聪，专权乱政，罔上负恩，谋国不忠”等罪名，下令抄家，削尽其官秩，剥夺生前所赐玺

书、四代诰命，以罪状示天下，满门查抄，从八十岁老母到幼稚孙儿，一家人饿死的饿死，流放的流放，凄惨不堪。来之不易的新政成果也付诸东流，历史出现了大倒退。

对此，历代学者议论多多，各有见地。如皇帝的出尔反尔、保守派的恶意攻讦、政敌的陷害暗算、既得利益阶层的硬顶软抗等，这是张居正人亡政息的客观因素。而其自身的主观原因，与张居正同朝为官的著名清官海瑞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：“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。”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。一是指张居正对政事井井有条，而对自己却忽略了，不善于保护自己，以致授人以柄；二是指张居正治国理政手腕很铁，自身要求却不检点，尤其是自己领导制定的规矩，自己带头破坏和逾越，以致毁誉获罪殃及家门。“拙于谋身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大明一朝，张居正以整饬吏治、雷厉风行著称，其铁腕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制定“考成法”，整肃官场吃喝玩乐腐败风。他为此领导制定了一条明确规定：无故到驿站免费吃喝的官员，一律摘去乌纱帽；而随便招待官员的驿站官吏，同样

要受到相应处罚。此招一出，全国驿站的经费锐减，节省了大笔开支，官员吃喝风也得到遏制。然而，这规定落到他自己头上就不灵了：为了省亲，他不惜斥巨资定做了32人抬大轿，有客厅，有卧室，有厨房，中间设有走廊，还有金童玉女摇扇、焚香。万历六年春他回乡葬父，一路上的排场、铺张，几乎参照皇帝出巡的样子。不但有千名皇家禁军随从，还配置了豪华仪仗和乐队，总兵戚继光又派出一队乌銃手开道护卫。途中所经之地都要清道警戒、贡奉美食。地方官员不仅要迎来送往，还得送上一份“奠金”。路过河北真定，知府钱普特意找来南方名厨，为张居正一行烹调美味佳肴。自己制定的规矩，自己却带头藐视和破坏，所谓的反腐败，充其量是“稻草人”！

再看一下张居正推行的教育改革。他上疏提出，礼部所属官员要品德端正，学生要专心读书，杜绝开后门、权钱交易等歪风。并专门制定了严密的“条例”，以规范礼部所属的太学、国子监及各府、县、乡学。明神宗立即下旨颁行，要求严格执行，对不遵守者立刻罢黜、不徇私情。可是到了张居正身上，又

成了“手电筒”：万历二年，长子敬修科考落第，他一怒之下，竟下令停止本次“馆选”，不惜致一批举子丧失做官的机会；三年后，次子嗣修科考，他让亲信张思维担任主考，又在太后、皇帝的袒护下挤掉才子汤显祖，让嗣修做了榜眼；更可耻的是，三子懋修参加万历八年科考，张居正作为廷试出题人，竟将策题告诉了儿子，使之夺得“廷试第一”，当了头名状元。在他的所作所为里，什么规矩、什么条例，统统都是废纸一张，活脱脱一个“造庙又作拆庙人”的形象！

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此乃一条被古今政治家反复验证了的至理名言。作为国家公器的执掌者，治国理政好比打铁，自身首先必须过硬。而这个硬，要义又在严于律己，率先垂范上。“拙于谋身”，从大处讲坏事业，从小处看更坏自身，不仅毁形象损操守，还会成为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，殃及家门，祸害子孙。张居正如此，今日落马的大小“老虎”们何尝不是如此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“拙于谋身”为每一个从政者敲响了警钟。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）

► 青年时代的张蕾老师